

游国恩屈赋作品考论

赵 然

(保定学院 信息技术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 要:游国恩是中国楚辞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时的关键性人物。他奠定了现代楚辞学的基础,成为我国现代楚辞学的集大成者。屈原作品篇数、次序自汉代以后就无定论。《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游国恩对屈赋作品篇数的认定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早期认为屈原作品总共十二篇,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最终确定屈原作品二十四篇。游国恩根据史实和作品文本详细考证了屈原作品的先后次序,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屈原作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游国恩;屈原;楚辞;《离骚》;《天问》

中图分类号:I207.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3-0090-09

由于楚辞产生的时代比较久远,至汉,屈原作品的数量已经不确定,所以历来争议较大,游国恩对屈原作品进行了考证。

一、屈赋作品篇数论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刘向所编校的楚辞集中,屈原辞赋二十五篇,次序为《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共计二十五篇。游国恩以为后人多拘泥此说,以二十五部作品凑之。作品数目不一,关键的一点是《九歌》的篇数差异。

以为《九歌》十一篇的有王逸、朱熹。王逸《楚辞章句》中的顺序为:《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大招》一篇(此篇不确定或曰景差作)。宋朱熹从王逸之说,在《楚辞集注》中的顺序为:《离骚》一篇;《九歌》十一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共二十五篇。

以为《九歌》有九篇,为宋人姚宽所创。他在《西溪从话·屈原赋篇数》:“今起《离骚》《远游》《天问》《卜居》《渔父》《大招》,而云《九歌》《九章》又十八,则原赋存者,二十四篇耳。”^[1]

清林云铭也以为《九歌》有九篇,他把《山鬼》《国殇》《礼魂》三篇合为一篇,理由是:“盖《山鬼》与正神不同,《国殇》、《礼魂》乃人之新死为鬼者。物以类聚,虽三篇,实止一篇,合前共得九,不必深文可也。”^[2]林云铭在《楚辞灯》里的顺序为:《离骚》一篇;《九歌》九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

收稿日期:2016-03-22

基金项目:2015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楚辞学与现代学术”(HB15WX043);2015年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民国楚辞学的转型与现代学术的建立”(ZD201528)

作者简介:赵 然(1974-),女,河北保定人,副教授,河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新闻传播。

《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辞》一篇;《招魂》一篇;《大招》一篇。共二十四篇。

清蒋骥以为《九歌》有九篇,《湘君》《湘夫人》合为一篇,《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确定楚辞作品顺序为:《离骚》一篇;《九歌》九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招魂》一篇。共二十四篇。

以为《九歌》十篇,为清人王夫之所创。《礼魂》为送神曲,“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就之所通用”^[345]。王夫之《楚辞通释》中的顺序为:《离骚》一篇;《九歌》十篇;《天问》一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一篇;《招魂》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共二十五篇。

晚清,随着西学东渐,一些学者开始使用西方的学术思想重新认识楚辞,开“五四”后新楚辞学的前奏。梁启超在《屈原研究》中所记篇目顺序如下:《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篇(《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九章》九篇(《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怀沙》);《远游》一篇;《招魂》一篇;《卜居》一篇;《渔父》一篇。共二十五篇。

1922年9月,胡适在《读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读楚辞》一文,提出了楚辞的五大疑点,其中有一个就是屈原作品的真实性。他说:“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作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435]胡适在《读楚辞》中列出了屈原作品的先后顺序:《离骚》《九章》的一部分。他认为《九歌》是最古的南方民族文学,《招魂》是屈原同时或稍后的作品,《卜居》《渔父》是屈原稍后至楚亡后的作品,《大招》《远游》《九章》的一部分,《天问》是汉人所作。

作为北京大学教师的胡适,他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学生游国恩。游国恩早期继承了老师的疑古思想,认为《九歌》是南方的文学,是楚辞的一个来源。在早期著作《楚辞概论》中游国恩认为现存的真屈赋有:“《离骚》《天问》《招魂》及《九章》九篇,而《九章》九篇中尚不免有贗鼎彝人,但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他,故也暂时不妨承认。其余如《远游》《卜居》《渔父》《大招》四篇也是后人伪托的。”^[5109-110]由此看出此时游国恩认为屈原的作品总共就十二篇。这与《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相比少了一半。

不过后来游国恩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在《屈赋考源》中承认《远游》也是屈原的作品。在1946年版的《屈原》中游国恩认为屈原的作品有十三篇,即《离骚》《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和《招魂》。游国恩《屈赋考源》中提出了屈赋的四观念:宇宙观念、神仙观念、神怪观念和歷史观念。《远游》集中体现了屈原的宇宙观念和神仙观念。游国恩考证屈原的宇宙观念:“《天问》中为最多,《离骚》及《远游》次之,他篇则甚少。”^[64]《远游》中有大量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诗句,如“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等。因此游国恩认为屈原具有强烈的天文意识。游国恩还考证《远游》中还有大量长生不老、修身炼形的诗句,如“漠虚静以恬愉兮,淡无为而自得”,“贵至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与化去而不见兮,名声著而日延”。他认为这与老子《道德经》恬淡无为和庄子《逍遥游》的长生久视是一样的道理。

在1963年版的《屈原》中,游国恩承认了《九歌》是经过屈原润色的作品。至此,游国恩认为屈原作品存世二十四篇。

几千年来一直认为《九歌》是屈原的作品,毫无异议。直到胡适的《读楚辞》发表,他认为“《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435]。陆侃如首先赞成此说,“用历史的眼光来断定《九歌》的时代,我以为是很不错的”。他在《屈原评传》中曾举出胡适的两条重要理由:“一,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则《楚辞》的来源便找不出,文学史便变成神异记了。二,《九歌》显然是《离骚》等篇的前驱。我们与其把这种进化归于屈原一人,宁可归于《楚辞》本身。”^[572]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九歌》不是屈原所作的理由。第一,从形式上判断,屈原的

作品形式是以六字句或者七字句为主,间一句用一个“兮”字,并且“兮”字都在句末,如“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而《九歌》多是以五字句或六字句为主,句句都用“兮”字,而“兮”字在句中间,如“吉日兮良辰,穆将愉兮上皇”。虽然在《山鬼》《国殇》《少司命》《东君》《河伯》中的一部分是七字句,但只是句子略加扩张,并没有根本改变句法构造。第二,从篇幅长短来看,屈原的作品长的多,短的少,《离骚》《天问》等作品三四百句,就是最短的《橘颂》也有数十句。《九歌》中的作品则都比较短,其中最长的《大司命》只有二十八句。《九歌》的写作风格也与屈原的其他作品迥异。第三,屈原的作品中多数具有“乱辞”“少歌”“倡”等尾声,而《九歌》的十一篇作品竟然都没有。所以游国恩认定《九歌》是屈原以前的民众文学。

在1963年的《屈原》中游国恩加入了《九歌》部分。关于作者问题他赞成朱熹的说法,屈原仅仅对《九歌》这一民间祭歌作了修改润色,“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九歌》起初本是民间口头创作,它的歌词应出于劳动人民之手或者是巫祝们编造。屈原是“一位善于向人民创作学习的诗人”,所以他有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作品时就会从中吸取营养,丰富自己的创作,而且还会对其进行加工润色。游国恩从作品本身入手寻找证据。他列举了《九歌》中的句子在屈原其他作品中也出现过,如《云中君》的“与日月兮齐光”一句在《涉江》中出现过,《湘夫人》中的“九嶷缤兮并迎”在《离骚》中出现过,只不过《离骚》中“兮”字做“其”字。这些现象说明了屈原与《九歌》的关系。

二、屈赋作品次序论

既然屈原作品的真伪难以确定,那么要想确定作品的先后顺序就是更难了。游国恩在研究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早年游国恩在《楚辞概论》排列了屈赋作品的大致时间,详见表1。

表1 屈赋作品次序

次序	作品	时 间	记 事
1	《天问》	怀王十三年(公元前316年)	怀王王使为宪令,上官大夫欲夺其稿,不与,因谗之,遂见疏。
2	《惜诵》	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	谏绝齐,不听,被谗去职。
3	《抽思》	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秋)	谏不听,被谗,四月,放于汉北。
4	《悲回风》	怀王二十四年(公元前305年冬)	谏不听,被谗,四月,放于汉北。
5	《离骚》	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	屈原嫉子兰劝王入秦,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顷襄王一怒而迁之。二月,沿江东行。
6	《思美人》	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	屈原嫉子兰劝王入秦,子兰使上官大夫短屈原。顷襄王一怒而迁之。二月,沿江东行。
7	《哀郢》	顷襄王十一年(公元前288年)	自再放至是九年。
8	《涉江》	顷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87年)	其年春,自鄂渚西南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溆。
9	《橘颂》	顷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87年)	其年春,自鄂渚西南行,入洞庭,溯沅水,至辰溆。
10	《怀沙》	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	四月,自溆浦东北行,至长沙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11	《招魂》	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	四月,自溆浦东北行,至长沙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12	《惜往日》	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	四月,自溆浦东北行,至长沙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

游国恩青年时期关于屈赋作品的次序问题的说法与晚年时不同,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九章》的顺序为:《惜诵》《抽思》《思美人》《哀郢》《悲回风》《涉江》《橘颂》《怀沙》《惜往日》。

1.《天问》《橘颂》的创作年代

《天问》的创作年代历来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于是治楚辞学者根据自己判断推测一个大致的时

代。王逸以为:

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璋僂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懣,舒写愁思。^{[7]85}

王逸只说《天问》是屈原放逐时的作品,具体的时间没有明确。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楚之先王庙、公卿祠堂这些地方是非常神圣的,一般由专人看守,屈原缘何能入?“书其壁”就更离谱了,壁画上的山川神灵在古人看来都具有神圣的色彩,岂能由屈原任意涂抹?所以王逸的“呵壁”之说是靠不住的。不过王逸的观点影响到了朱熹,他认为《天问》是屈原初放时的作品。《楚辞辩证》曰:“屈子初放犹未尝有愤然自绝之意,故《九歌》《天问》《远游》《卜居》以及此卷《惜诵》《涉江》《哀郢》诸篇皆无一语以及自沉之事。而其词气雍容整暇尚无以异于平日。”^{[8]1062}毛西河认为《天问》是屈原放逐时的作品,作于怀王十七年以后。他的依据是,“厥严不奉,帝何求”两句连起来解释,“薄暮雷电,呵而问时之境也。……言薄暮雷电,可以归矣,何以忧不能自己也?为君所放,不得事君,使我不能奉承其威严;不知君固何所求於我也”^{[9]80}。毛西河说“荆动作师”一句为指“怀王大兴师伐秦,败於丹浙,复悉发国中兵击秦,战於蓝田一事”。此时为怀王十七年,所以《天问》成于十七年。游国恩认为把屈原放逐一事附会上去,这样的解释太牵强。游国恩认为《天问》是屈原作品中最早的作品,其中绝无放逐的痕迹,只能说他带有愤懣和失意的情绪。他认为《天问》是屈原头一次被谗去职以后,放于汉北以前所作,也许就是上官大夫夺稿未遂之后的事情。游国恩给出了两个理由。

其一,当时屈原很受怀王信任,不料因上官大夫的谗言而去职,这意外的打击让屈原很懊丧,由懊丧而生疑,由疑而问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篇中“提及善恶因果的问题,而没有一句悲伤的话,就是为了这个缘故”^{[9]81}。

其二,从文体发展变化来看,《天问》也应该最早。《天问》通篇以四言为主,形式与《诗经》相近,“后来他觉得这种形式太束缚不适用,才改用‘骚体’为文。所以在《天问》的时代没有确实的证明以前,定他为第一次被谗去职时所作,大概不至于十分离经”^{[9]81}。

游国恩提出《天问》是第一次放逐之后的作品,并且是早期的作品,这两点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说《天问》是屈原最早的作品则有待进一步斟酌。在屈原的作品中还有一篇也是四言为主的《橘颂》。这篇会不会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呢?游国恩把这篇作品定于屈原晚期的作品,大概成于顷襄王十二年,公元前287年。他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是诗中提到的“受命不迁,生南国兮”,“南国”指江南,说明屈原已经到了“湖湘之间”。蒋骥、林云铭也都持此说。陆侃如认为《橘颂》屈原未成年时的作品。如果沿着游国恩推断《天问》的思路,从文体形式上看,《橘颂》可能是屈原早期的作品。且“颂”是诗之“六义”的一种,“‘颂’的意义最初只是施于宗庙的赞美诗”^{[9]116},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屈原当然知道“颂”的意义。至于“南国”,也未必指江南,橘子中国生长的范围很大,北至秦岭,南到海南岛的广大地区都生长。“国”的概念,也不一定指楚国。它的本义是“邦国、疆域”,所以“南国”也可指南方的广大疆域,在《橘颂》这篇文章中“南国”也可以指楚国。《橘颂》是一篇咏物赋,屈原在这里是把楚国比喻成橘,颂扬他对楚国的热爱。笔者认为这篇充满朝气的文章不可能在屈原暮年写成,只能写于屈原早期,也就是他现存最早的作品,且应早于《天问》。

2.《惜诵》的创作时代

王逸以为《惜诵》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他思君念国,忧心罔极,复作《九章》。朱熹言:“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10]53}王逸与朱熹都认为《惜诵》是屈原放逐后的作品。至清代王夫之也从前人之说认为此篇与《离骚》《远游》一样皆有归隐之说。“此章虽作于顷襄王之世,迁窜江南之后,与彼异时。而所述者乃未迁已前屏居汉北之情事,故与彼同。而无决于自沉之意”^{[17]0}。同朝林云铭、蒋骥提出异议。林云铭云:“《惜诵》乃怀王见疏之

后,又进言得罪,然亦未放。”^{[2]89}蒋骥云:“盖原于怀王见疏之后,复乘间自陈,而益被谗致困。故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1]111}林云铭、蒋骥认为《惜诵》是在屈原见疏之后,被放之前写成的。持此观点的还有陈子展,他在《楚辞直解》中说:“此篇当作于怀王之世,见疏之后,被放之前。”^[12]游国恩指出了蒋、林二人观点的差异,蒋骥认为《惜诵》当作于《离骚》之前,而林云铭认为是继《离骚》而作。游国恩认为蒋骥在《楚辞余论》中提出的“自骚经言从彭咸之所居,厥后历怀襄数十年不变。此篇曰,‘愿曾思而远身’,则犹回车复路之初愿,余固知其作于骚经之前。而经所云‘指九天以为正’,殆指此而言也。这话也很有理由”^{[9]103}。但对于蒋骥言《惜诵》为二十五篇之首的说法游国恩并不认同。他根据《惜诵》的文本和《史记》的记载推断此篇作于怀王十六年。理由如下:

其一,文中“欲儇徊以干僚兮,恐重患而离尤;欲高飞而逮集兮,君罔谓女何之”,“桥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这其中正是表达了他进退两难的情形。他想留下来,又怕为小人的所害;想高飞远举,又怕怀王责备他寡情;最后他还是想远身避害。“这便是《惜诵》非放逐时作的铁证”^{[9]102}。

其二,从“惜诵”二字的解释可知此篇为非放逐时的作品。游国恩引《吕氏春秋·长利篇》:“为天下惜死。”高诱注:“惜,爱也。”《广雅·释诂》训“惜”为“爱”。《说文》“诵,讽也”。《国语·楚语》有:“宴居有工师之诵。”韦昭注“诵,谓箴谏也”。因此“惜诵”就是“好谏”的意思。他批驳了王逸的“贪论”说和朱熹的“爱惜其言”说,认为这两种说法实为不通。他恨王听之不聪明,所以他发誓以明自己所言之忠。正如《惜诵》说:“忠何罪以遇罚兮?亦非余之所志也!”由此推知他此时没有被放逐。

其三,从《史记》的史料看此篇成时,屈原尚未被放逐。《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

屈原既绌,其后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13]1934}

根据《史记·楚世家》:“十六年,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13]1409} 这年是怀王十六年。屈原深深了解秦人的阴险与狡诈,所以素来主张联齐以拒秦,这次楚国受骗自然早在他的料意之中。虽然因宪令的事屈原见疏,但由于忠贞与正直的品格还是忍不住要谏言。无奈贪而无识的怀王不仅不听,而且还免了他的职。《惜诵》正是作于这一年,即怀王十六年。

游国恩根据文本和史料的推断是比较严密的,在没有准确出土文献证明的情况下,可信度是比较高的。

3.《抽思》的创作年代

王逸以为《抽思》是屈原放逐江南时所作。林云铭、蒋骥认为此篇为屈原居汉北时所作,且为怀王时。林云铭言:“今读是篇,明明道出汉北不能南归一大段,则当年怀王之迁原于远,疑在此地。”^{[2]103} 蒋骥:“今观此篇曰‘来集汉北’,又其逝郢曰‘南指月与列星’,则汉北为所迁地无疑。”^{[1]126} 就具体时间而言,林云铭认为当在怀王十七年之后,而蒋骥则指出屈原在汉北“亦滴宦于斯,非顷襄弃逐江南比”。游国恩指出二人的观点是正确的。他指出二人共同的依据就是文中的“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游国恩指出:“三个‘南’字便可看出他是放在郢都之北。”^{[9]104}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句中的“鸟”,释为“盖自喻,屈原生于夔峡,而仕于郢郢,是自南而集于汉北也”^{[10]64}。游国恩认为此说并不正确。蒋骥也指出,“朱子集注多误解,且林云铭辨之颇当”。王夫之则以为此篇是迁于江南之后做。王夫之说:“原于顷襄王之世,迁于江南。道路忧悲,不能自释。追思不得于君见妒于谗之始,自怀王背己而从邪佞,乃自退居汉北以来,虽然遭恶怒,未尝一日忘君。而谗忌益张,嗣君益惑。至于见迁南行,反己无疚,而世无可语。故作此篇以自述其情。”^{[3]81}

至于《抽思》作于怀王哪一年,游国恩做了进一步考证。楚国的亲秦政策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怀王是十六年,一是怀王二十四年。游国恩认为怀王放逐屈原的时间是二十四年,《抽思》作于那年秋天,

因为篇中有“悲秋风之动容”一句可证。具体理由有两点:

其一,从《抽思》中谏君的语气分析,屈原谏君失败不止一次。文中提到“数惟荝之多怒兮”,“兹历情以陈辞兮”,“初吾所陈之耿著兮”,这些词语说明怀王王十六年以前的见疏,是因为宪令被谗,而不是因谏净。屈原第一次谏君失败在怀王十六年张仪至楚一事。如果《抽思》作于这年,文中就应该不会出现几次谏君的语气,所以应作于怀王二十四年。

其二,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13]1935}可以证明这时屈原没有被放逐。作品《抽思》中提到了汉北,郢路辽远之类的话,说明屈原已经放逐在外了。因此《抽思》不可能是怀王十六年作的。

游国恩的两点证据很具有说服力。

4.《悲回风》的创作年代

《楚辞概论》中紧随《抽思》之后的作品是《悲回风》,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冬天。游国恩后来对《悲回风》的创作时间做了更改,认为此篇应作于《哀郢》之后,是襄王时的作品。

朱熹、林云铭、王夫之、蒋骥等人皆认为《悲回风》是屈原迁江南时的作品。朱熹在《楚辞辩证》中说:“《抽思》以下,死期渐迫近,至《惜往日》、《悲回风》则其身已临沅湘之渊,而命在晷刻矣。顾恐小人蔽君之罪暗而不章,不得以为后世深切著明之戒。”^{[8]1062}林云铭说:“当高秋摇落景况,寄慨时事,以彭咸谓法,且明赴渊有待之故,则《悲回风》也。”^{[2]91}蒋骥认为此篇继《怀沙》而作,“为彭咸之志,反复著明。几已死矣,而卒不死,盖恐死不足以悟君”^{[3]144},作于自沉前一年的秋天。王夫之认为此篇为屈子自沉永诀之辞。

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并不认同上述观点。他认为篇尾的“任重石之何益”一句恰好证明屈原这时尚无绝死之志。他比较了《悲回风》和《抽思》两篇文章的相同之处,两篇文章都有夏秋两季的描写,甚至《悲回风》中还出现了“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的句子,说明已经由秋入冬,这篇作品最早当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十月以后。

游国恩判断《悲回风》不是屈原后期作品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文中的地名。诗句:“浮江淮而入海兮,送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抽思》作品中提到了汉北,这里提到了淮河和黄河,地点是很相近的。这也可以证明这两篇作品的时代相近。游国恩援引陆侃如《屈原评传》中的话:“屈原作品中谈及淮与河的,只有这次。我们知道他初放的地点是在汉北,恰在淮水的发源地,而与黄河距离也近。因此,我以为《悲回风》一定是在汉北作的。”^[14]游国恩认为陆侃如的推论很合理,但是对他定这篇为怀王十六年所作并不认同。

195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了游国恩的《屈原作品介绍》一文,他对上述观点作了修正:“《悲回风》的写作不能确定在何年。但据篇中有云:‘岁习习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蘋蘩椿而节离兮,芳已歇而不比。’屈原此时似已将近衰老之年。故知此篇亦必是再放期内所作。”^{[15]224}游国恩对此没有再进一步详细论述。

5.《离骚》的创作年代

《离骚》的创作年代历来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分成三种说法。一是作于怀王时期,持此观点的有刘向、王逸、王夫之、蒋骥、孙作云、林庚、金开诚、赵逵夫等人。二是作于怀王末期至顷襄王初年间,持此观点的有刘永济、姜亮夫、刘生良、张宏洪等人。三是作于顷襄王时期,持此观点的有游国恩、潘啸龙、谭介甫等人。如游国恩所言,“治楚辞的学者,莫不以《离骚》这篇为屈原初次被谗见疏的作品”^{[9]88},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较多。游国恩分析了其中的缘由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王怒而疏平”一段记载。游国恩考证了“疏”“逐”“流”三字在楚辞版本流传上的变化。按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同列上官大夫,靳尚妨害其能,共谮毁之。王乃疏屈原。”^{[7]2}王逸接着又说:“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愬,乃作《离骚经》。‘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

径以讽谏君也。”^[77]至洪兴祖把“‘疏’一作‘逐’”。《文选·离骚》李善注引“疏作流”。为什么上文说“疏”，下文又何以忽说“放逐”？由此可知王逸原文本是作“逐”的，洪兴祖所见本作“逐”，“还保存着王书的本来面目；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洪氏所见的一本来订正《史记》屈原传的错误的，且可决定《离骚》一篇是屈原放逐以后的作品”^[78]。除此之外游国恩还举出了刘向《新序·节士篇》《汉书·贾谊传》《汉书·司马迁传》中均为“逐”的例子。

游国恩还从文本入手论证《离骚》为屈原放逐后的作品。诗中说“余既不难夫离别兮”，“延佇乎吾将反”，此证明屈原放逐在外，希望回到郢都。“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激河”，“朝发轫於苍梧兮，夕余至乎悬圃”，诗中提到的这些地点是因为他的“放地与苍梧相隔不远”^[79]。诗中的“愿依彭咸之遗则”，“独穷困乎此时”，“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虽九死其犹未悔”等，可以看出这不是见疏的语气，而是见放后的“愤语”。偶然一次被谗见疏是很平常的事，应该不会想到自杀。因此《离骚》是放逐后的作品。

游国恩认为《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时被放逐后而作，因为诗中有“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首先说“不及”，其次说“迟暮”，三说“老冉冉其将至”，这显然是“年将就衰的口气”^[80]。文章中的屈原还提到“灵修”和“哲王”，游国恩认为“灵修”指怀王，“哲王”指襄王。他说“作《离骚》时，怀王大概已死，所以称‘灵修’犹言‘先王’，‘先帝’，‘皇考’，‘显考’等。其时正当顷襄王在位，故称‘哲王’，犹言‘今上’，‘圣上’等，语气极有分寸”^[81]。游国恩考证屈原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到顷襄王三年乙丑，已经四十八岁了，与文章中言及的“老、衰”应该是合的上。

但是古人言老是有严格规定的，七十岁方可言老。《礼记·曲礼上》：“七十曰老，而传。”^[82]《说文解字》：“七十曰老。”所以笔者认为游国恩此处的推断应该不准确。按照上文的推算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至七十岁时是公元前283年，顷襄王十六年。因此《离骚》的创作年代最早超不过襄王十六年。

6.《思美人》《哀郢》的创作年代

林云铭、蒋骥认为《思美人》是怀王时放居汉北所作，与《抽思》同时。班固、王逸、洪兴祖、朱熹、王夫之等人皆说放于江南时所做。林云铭以为《思美人》：“屈子思怀王所作。疏放之后，媒绝路阻，言不能达，然欲变节从俗，宁老死於外亦不可为。”^[83]蒋骥：“按汉水出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县。故《思美人》云‘指嶓冢之西隈’，以身在汉北。举现前汉水所出言之，则原之迁此何疑？”^[84]游国恩认为二人的证据不够充分，篇中的“嶓冢”为理想而非事实，与《悲回风》中的“昆仑”“岷山”是一样的，不能“死看”。篇中的“南行”也与《抽思》不同，《抽思》在汉北，相对郢都而言故称“南行”。《思美人》是“遵江南行”，诗中云“遵江夏以娱忧”。“南人”也不是指朝臣，是指南方蛮夷。

在《思美人》和《哀郢》中同时出现了一个地名“江夏”，游国恩认为这是判定《思美人》创作时间的一个重要线索，由此可知《思美人》与《哀郢》的创作地点是差不多的。从时间上来看两篇文章都提到春季，《哀郢》“方仲春而东迁”，《思美人》“开春发岁兮”。这说明两篇文章的描述的时间大致相同。

《哀郢》中提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东迁”。游国恩根据《史记》屈原传的记载：“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集解》：“离骚序曰：‘迁于江南。’”^[85]游国恩认为此时的“迁”与《哀郢》中的“东迁”是一致的。屈原这次被放是时间大概是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哀郢》中有一句“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治楚辞者都根据这一句判定《哀郢》为第二次放逐后第九年的作品，学者们基本上没有异议。陆侃如提出此处的“九”为虚数，与《九歌》《九章》的“九”字一样，屈原身处逆境不一定能把时间记清楚。游国恩对此进行了反驳，认为此处的“九”为实数。因此《哀郢》的创作时间为襄王十一年，即公元前288年。

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读骚论微初集》，游国恩在《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一文中说：“盖以《哀郢》之作，在顷襄王二十一年白起破郢之后也。”^[86]即公元前278年。

1953年6月15日《光明日报》刊发的游国恩的《屈原作品介绍》中,游国恩说:“屈原再放不能确定是那一年,可能在顷襄王七、八年左右(前二九二—二九一),也可能在此以后,所以《思美人》究竟作于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根据《哀郢》中的“九年而不复”一句判定《哀郢》作于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

7.《涉江》的创作年代

蒋骥说:“《涉江》、《哀郢》,皆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所作。然《哀郢》发郢而至陵阳,皆自西徂东,《涉江》从鄂渚入溱浦,乃自东北往西南,当在既放陵阳之后。”^{[11]117}游国恩认为蒋骥的一大发现就是看出了《涉江》在《哀郢》之后。《楚辞概论》中游国恩接《哀郢》的推断时间,继续推算《涉江》的时间至少必作于顷襄王十一年以后。“因为他这次被放,在外九年,还等不着召回的消息,所以才决意向西向西南走了,他从此再也没有归故乡的希望了”^{[9]114}。

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中把《涉江》认定成是顷襄王二十一年以后的作品,他没有说明理由。

8.《怀沙》的创作年代

《怀沙》一篇常被认定为屈原的绝笔。《史记》中说:“乃作怀沙之赋。”《索隐》按:“楚词《九怀》曰‘怀沙砾以自沈’,此其义也。”^{[13]1937}之后说:“于是怀石遂自沈汨罗以死。”^{[13]1939}林云铭:“《怀沙》则绝命之词,以不得于当身,而俟之来世为期。”^{[2]90}于是后人多附会,以为此篇为屈原绝笔,“怀沙”为“怀石”蒋骥认为“沙”本地名,与《哀郢》《涉江》同义,即今天的长沙,《怀沙》寓意怀其地。蒋骥在余论中引《战国策》《史记》《山海经》《路史》等书证明古有长沙之名。游国恩认为蒋氏之说纠正了两千年来相沿的错误。《楚辞概论》中游国恩定《怀沙》作于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

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中把《怀沙》创作的时间定为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77年,夏历四月中。

9.《招魂》的创作年代

关于《招魂》的创作年代,游国恩没有明确说明。《楚辞概论》中在《屈原年表》中列出《招魂》作于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在《屈原作品介绍》部分游国恩对《招魂》的创作年代也未作说明。

10.《惜往日》的创作年代

蒋骥:“《惜往日》,其灵均绝笔欤!夫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以死悟之,此世所谓孤注也。”^{[11]137}游国恩认为《惜往日》是屈原最后的作品,也是他的绝命词。因为文中“前面回忆怀王如何的信任他,以及他当国时的政绩,中间叙谗人的构陷与君上的不明,以致放逐在外;并且徵引百里、伊尹、子胥、介推的事以希望君之一悟;后面说他所以要自沉,一方面是想‘陈情自行’,一方面是想‘恐祸殃之有再’。低徊反覆,次叙井然。”^{[9]119-120}

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中没有说明《惜往日》的具体时间,只说是绝笔之作。

11.《九歌》的创作年代

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认为《九歌》不是屈原的作品。人们把它当做是屈原的作品,大概始于刘向,后来王逸才加以说明:“《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千余年来人们并无异议,直到胡适提出:“《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4]36}游国恩认为尽管胡适没有拿出确实的证据,但是很有道理。游国恩根据《九歌·国殇》中的“错毂”“左骖”“四马”,可知是指“车战”。历史上车战之法到战国时就已经不再使用了,《九歌》就必是战国之前春秋时的作品。根据诗中的“操吴戈”断定它的产生必不能在周简王二年,公元前584年。

游国恩在《屈原作品介绍》中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九歌》起初本是民间的口头创作,后来才经过屈原写定或修改的。”^{[15]231}《汉书·郊祀志》载谷永对成帝说:“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军,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17]对此,游国恩认为既然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自然需要有一套祭歌。屈原改变民间歌谣有可能是在怀王十七、十八年,公元前312—公元前311年,那时屈原还是被信任的时候。

综上所述,游国恩对于屈原作品的认定和次序的排列上经历了一个前后变化的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出游国恩的楚辞学具有乾嘉学派的余韵,学风呈现严谨求实的特点。曹道衡和沈玉成在《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评价说:“先生的学风谨严,植根乾嘉,一贯主张在充分掌握原始材料,而不是辗转稗贩的基础上寻求结论;反之,‘游谈无根’则是他习惯使用的最严厉的批评语言。”^[18]游国恩在考证楚辞作品及其内容上集中体现了乾嘉学派治学严谨、学风朴实的特点。

参考文献:

- [1]姚 宽,陆 游.西溪丛语 家世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1997:31.
- [2]林云铭.楚辞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3]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4]褚斌杰.屈原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 [5]游国恩.楚辞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 [6]游国恩.游国恩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7]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8]永 瑒,纪 昀.四库全书·集部·楚辞辩证(台湾文渊阁本)[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 [9]游国恩.游国恩楚辞论著集:第三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
- [10]朱 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3.
- [11]蒋 驥.山带阁注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12]陈子展.楚辞直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179.
- [13]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4]陆侃如.屈原·屈原评传[M].上海:上海东亚图书馆,1930:44.
- [15]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6]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曲礼上[M].阮 元,校.北京:中华书局,1982:8.
- [17]班 固.汉书·扬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1042.
- [18]曹道衡,沈玉成.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编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59.

Research on the Validation of Qu Yuan's Works by You Guo-en

Zhao Ran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research of Chuci, You Guo-en is the key representativ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who lay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Chuci. The number and the order of Qu Yuan's works was inconclusive since the Han Dynasty. *Hanshu Yiwenzhi* recorded that Qu Yuan's works were 25 altogether. You Guo-en had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change about the number of Qu Yuan's works. Early he thought Qu Yuan's works amounted to 12. After nearly half a century of study, You Guo-en finally concluded that Qu Yuan's works were 24.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facts and details of Qu Yuan's works, You Guo-en validated the order of the works. He provide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to further study Qu Yuan's works.

Key words: You Guo-en; Qu Yuan; Chuci; *Lisao*; *Tianwen*

(责任编辑 王 作)